

# 云南诺邓盐井的 求雨仪式

◎朱霞

求雨是中国农业社会中典型的生产祭祀活动，是旱情威胁农业生产时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，是以祈求龙王赐给雨水，解除干旱，获得农业收成为目的。2002年6月和2003年3月，我两次到云南省云龙县诺邓盐井进行田野调查，发现在非农业社会同样存在着求雨仪式，并获得了第一手关于井盐社会求雨的田野资料。诺邓井是一个有着1200年历史的井盐村落，以生产井盐为生。与农业社会的求雨仪式相比，诺邓村的求雨仪式别具特色，并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含义，反映了盐业社会的特点以及与农业社会的联系。

## 一、背景

在云南历史上，盐矿开采有限，食盐紧缺，而盐业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。云南省云龙县诺邓井是云南最古老的著名盐井之一，唐代樊绰《云南志》就记载：“剑川有细诺邓井”，<sup>①</sup>明代它成为盐政管理机构“五井盐课提举司”<sup>②</sup>的治所。到了民国时期，每日上缴官盐达到了1925斤，灶户有230多户，诺邓村的井盐生产持续了七个朝代，到1996年封井，停止生产。



1949年以前,诺邓村是以井盐生产作为生存的主要手段,农业收入在经济生活中占的比例不大,以种植玉米为主,作为盐业经济的补充。井盐生产是主要经济支柱,而井盐生产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是汲卤。汲卤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,主要是由卤工从22米深的井下汲出卤水,并提到井上,作为井盐生产的原料。卤水的质量——浓与淡是井盐生产好坏的重要因素。而在生产中,卤水(咸水)与雨水(淡水)是不相容的,因此,干季是井盐生产的旺季,而雨季是生产的淡季。民间有“空平旺淡”的说法:“冬春就旺,夏秋季就平,雨水天就淡,太淡不要就叫空”。<sup>⑨</sup>因此,盐业社会对雨水的需求与农业社会完全不一样。对于井盐生产来说,雨水会导致卤淡,增加成本,降低井盐生产的效率。尽管如此,在天旱时,诺邓村也举行求雨活动。

与一般农业社会不同,诺邓村把龙王分为卤龙王和水龙王两类。卤龙王主管卤水,地位最尊,是井盐生产的保护神。每年农历六月十三雨季时,诺邓要举行“龙王会”祭祀卤龙王,祈求卤旺盐丰。水龙王主管雨水,地位低于卤龙王,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,求雨的对象是卤龙王手下的水龙王,求雨仪式被置于卤龙王的权威之下。根据诺邓村的老人的回忆,1949以前,诺邓村在干旱严重时举行过求雨活动。但是,诺邓盐业社会的求雨仪式与农业社会的有所不同,求雨是一个全村人参加的狂欢、诙谐的仪式活动。求雨仪式分为两个部分同时进行。

## 二、求雨仪式的过程

### 1. 耍柳条、菜花龙——狂欢仪式

在诺邓,向水龙王祈雨是一个全村参加的神圣与世俗混合在一起的狂欢仪式。一方面,祈雨有严肃的祭祀仪式,要朝拜渌波天主,要请道教的高功念经、奏表,要扎神龙请求降雨。一方面,又有全村参与的充满世俗的狂欢仪式。当高功主持的法事进行到给神龙下牒文时,在锣鼓和炮竹声中,十多个小伙子就舞着扎好的龙向村中行



进,边行边舞,绕村一圈。老人们说,求雨时耍的龙,与节庆时耍的龙不一样,耍柳条、菜花龙。这种用于求雨的龙,形状虽然与节庆时耍的龙一样,分为龙头和龙身,龙身又由好几段组成。但是,用于求雨的龙是用碧绿的柳条和金黄的菜花扎成的,黄绿相间,舞起来充满了生机,是白天耍的;而节庆时耍的龙是用红布做成的,龙头、龙身和绣球里面都点油蜡灯,舞起来充满了节日的喜庆,是夜晚耍的。耍柳条、菜花扎的“求雨龙”,目的是解除旱情,是求雨仪式的一部分。诺邓的黄金鼎老人说:

这个柳条、菜花扎的龙就是白天耍了,通过村子里面,走到哪里,大家就倒水在龙的身上,又是求雨,又是图好玩。啊嘛,通过人户密集的地方,有多少水泼在他们身上,连人、连龙一起浇了。耍龙的人是穿短裤,上衣也不穿,是小伙子,他们也不怕浇。<sup>④</sup>

在中国,耍龙这一形式是与娱乐分不开的,总是有龙和观众。一般节庆中耍龙,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是以观看和欣赏为主,在龙、耍龙人与观众之间有一定距离。在诺邓,耍“求雨龙”有更强的娱乐成分和狂欢色彩,“求雨龙”是由年轻的小伙子在村中各个地方耍,每到一处人们事先准备好一桶桶清水,争相用水泼“求雨龙”和耍龙人,求雨仪式充满了打闹、嬉笑。泼水的村民不是被动的观众,而是求雨仪式的积极参与者,扮演着特定的角色——求雨者。龙、耍龙人和求雨者之间产生直接的互动和交流,具有明显的狂欢精神。因此,老人们说又是求雨,又是图好玩。

## 2. 烙水泉——诙谐仪式

“求雨龙”在村中各处被村民泼水时,另一个仪式同时在周围的山上进行着。那就是诺邓村向水龙王求雨仪式的另一组成部分——烙水泉。老人们说,过去认为把烧红的铁放到水泉中烙,能把水龙王从水中逗出来,兴风作雨,这是求雨成功的重要一环。黄



金鼎老人说：

另外的一伙人看好哪座山上的云黑，就在这座山上找水井、水塘，就在这些地方准备好。哪座山的云黑，就是哪一座山上的龙恶一点、厉害一点了嘛(笑)。村中那边龙耍起，这边烧着铁锅盖，烧红了就放在水中逗他(水龙王)嘛。烧红么就“气——”地一声放在水中搞他，来逗他，水里冒出了好些水汽(笑)。不怕他不得(不高兴)，用烧红的铁来烫他，就是要他(水龙王)不得，龙不得了，它就会出来兴风作雨，就下雨了嘛。好玩啦。哎，往往还是下了雨的，会那么凑巧。<sup>⑤</sup>

与耍柳条、菜花龙一样，烙水泉是求雨仪式的另一组成部分，充满了逗趣、戏耍和捉弄的诙谐的气氛。从老人的叙述中，这种仪式有点像顽童的捣乱、玩笑，龙王你不是懒得出来下雨？我用烧红的铁来烫你了，看你出来不出来？龙王的神圣性在诙谐和戏耍中被削减了。

在诺邓人的心目中，每一个水井、水塘都有水龙王，水龙王是下界的神灵。诺邓流传着天池(诺邓地名)水龙王化为人形与凡人“打老友”(交朋友)的故事。<sup>⑥</sup>水龙王并不像卤龙王那么神圣不可亲近。与庄严、神圣和隆重的卤龙王祭祀仪式相比较，诺邓的求雨仪式显得轻松欢快。在卤龙王的权威下，诺邓人心目中的水龙王少了几分神性，多了几分人性。求雨仪式也少了几分隆重，多了几分诙谐，有狂欢的性质。与农业村社的求雨仪式相比，诺邓的求雨仪式发生了有趣的变异，这种变异的含义能够说明盐业社会的特点，以及盐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联系。

### 三、求雨仪式的民俗含义

为什么诺邓的求雨仪式充满了狂欢性质？为什么水龙王在盐业社会中扮演了一个有几分滑稽的角色？求雨仪式与盐业生产的关系



是什么？诺邓盐村求雨的主要目的和社会功能是什么？

在诺邓盐业社会中，民众把崇高的地位给予了卤龙王，而水龙王的神格在卤龙王的权威下发生了变形，水龙王在盐业社会的地位有所下降。与农业社会的求雨仪式相比较，盐业社会的求雨仪式轻松诙谐，充满了狂欢色彩，求雨者对龙王的態度也不相同。

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，求雨是一种普遍盛行的、严肃郑重的习俗，是大旱之年农民最后获得雨水的方法。20世纪20年代末，程云祥《潮州求雨的风俗》就农业社会的求雨方法作了一番概括，他说：“求雨的方法可分为恳求、贿赂、强迫三种。恳求的方法是乞情的，那老绅士代表民众的公意，要求他于某一时间满足他们的愿望，如过期而雨不至，他们就改用求贿赂的方法了。如果上举种种方法都不灵验时候，那就非用强迫的方法不可。一种是抬他的真身到日光下蒸晒，给他尝烈日的滋味；一种是采用三步一打的方法，但是听说当时实行这种方法之后，潮州九县几乎全被洪水淹没，所以以后再没有人敢再举行了。”<sup>⑦</sup>可以看出，潮州的求雨有按照顺序而行的三种方法——恳求、贿赂和强迫。这三种方法表明了求雨者由软至硬，从求到打的心理过程。说明了当地民众对主管雨水的龙王的依赖，人们对于旱情的越来越焦急的心情，以及雨水是农业社会的命脉的道理。

近年，董晓萍、蓝克利在《不灌而治》中详细描述了山西霍州阎家庄乡义旺村的求雨仪式，从起事——设堂——占验——上山——拜龙王庙——取湫——敲簸箕、刷擗杖——还愿的整个过程，求雨者是怀着敬畏、焦急的心情进行求雨的，仪式中不准说话，“如果说，婆婆用雨棍打，认为是对龙王爷不尊重，打给龙王看”<sup>⑧</sup>，在上山求雨时，有一个男孩边敲簸箕，边唱求雨歌：“敲簸箕，敲簸箕，不出三日三夜就下哩。吃水的娃饿死啦，寡妇婆婆瘦死了。”<sup>⑨</sup>孩子们还要把刷擗面杖的脏水喝掉以示虔诚。可以看出，山西霍州阎家庄乡义旺村的村民求雨的态度是虔诚、恳切、恭敬和焦虑的，它是民众在生存压力下做出的惟一可行的紧急措施，具有急迫性。求雨能不能



如愿,具有不确定性。在农业社会,祈雨的态度是恳切、无奈和焦急几种情绪糅合在一起的,与诺邓盐业社会的求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与一般农业村社的祈雨情况不同,在诺邓求雨仪式中,民众是怀着轻松、逗乐的心情朝柳条菜花龙和耍龙人肆意泼水,在水泉投烧红的铁,求雨的态度是半开玩笑、半认真的。对水龙王的态度不像农业社会中那样庄严、恭敬和诚惶诚恐,而是戏耍、嬉戏和欢闹。求雨仪式充满了自由与欢笑的气氛,明显具有狂欢化的精神。文化诗学的倡导者巴赫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,一种是日常生活,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,他说:“在狂欢节期间,人们只能按照它的规律,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。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,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,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和更新。就其观念和本质而言,这就是狂欢节,其本质是所有参加者都能活生生地感觉到的。”<sup>⑩</sup>程正民在《巴赫金的文化诗学》中认为,巴赫金的“这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是解构也是建构,它不仅要解构一切凝固和僵化的秩序、规范和思想,也要创造,也要建构”<sup>⑪</sup>。从诺邓的求雨来看,求雨是一种全民参与的狂欢节,它借助狂欢化的形式,以一种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“颠倒”方式来祈雨,反映了盐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本质,实际上来解构农业社会的某些秩序和规范。同时也建构盐业社会的某种原则,这种原则反映了盐业社会的本质的需求。

盐业社会对雨水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社会,在诺邓,与盐业密切相关的卤龙王比与农业相关的水龙王更受人们的尊敬,具有更崇高的地位,诺邓人向卤龙王祈求卤旺盐丰的恳切与郑重的心情,与农业村社的求雨心情相似。而求雨仪式,从根本上来讲,与盐业生产是相互冲突的。诺邓盐业社会是以生产井盐为主,井盐的产量与雨水有相当大的关系。一年四季根据雨水的多少,有空、平、旺、淡之分。冬季就旺,春秋就平,夏季就淡季,雨水太多就空。求雨实际上与主体经济,即盐业生产有矛盾。雨量多会使井盐减产,变成更大的灾害。



因此,诺邓求雨有一种复杂的心理,既求雨,又怕多雨,是以求适量的雨,既解除旱情,又不危害井盐生产为宜。诺邓村民认为卤龙王是龙王的首领,四方水龙王都要听命于卤龙王,水龙王崇拜是被置于卤龙王的权威之下,水龙王的神圣性受到一定压抑,神格发生一定的变异。因此,在求雨中很容易产生一种在农业社会来看是“颠倒”的行为和态度,即民众对水龙王有几分戏耍,水龙王扮演了一个有几分滑稽的角色。求雨仪式也充满了轻松、逗乐和诙谐的狂欢色彩,成为村民集体参与的一个狂欢节。在欢闹、嬉戏和笑声中折射了人们对水龙王和求雨的态度,它并不是像农业社会那样郑重和庄严,暗示着井地人民对雨水有特定需求。求雨仪式主要不是民众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的一种紧急措施,与一般农业社会的求雨仪式就有本质不同。那么,求雨仪式的主要功能是什么?

老人们说,天旱对井盐的生产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。但天太干旱对农业不好,雨水下得多又对井盐生产不好,两者是矛盾的。我问:“既然如此,为什么还要举行求雨?”诺邓的杨黄德老人说:

做事情处处都要照顾到的。过去诺邓的地少,但还是有一些人要靠它吃饭的,周周围围的村子也要靠它吃饭的。<sup>⑩</sup>

在诺邓,穷人和荒户确实较多地依赖山地所产的玉米,而周围的山村全部都要依赖农业为生。可以看出,诺邓的求雨主要是为了谐调地井的局部利益和与周围村落的关系,而不是为了井地的主要群体——灶户的利益。反映了诺邓井盐生产民俗并没有忽视和排挤农业生产民俗,表达了一个以盐业为主的村落在一个农业大国中如何自处的智慧。以盐业为主的村落既注意到了村落内的次要群体的利益,也注意到了与周围农业村落的关系。从表面上看,诺邓的求雨仪式对于村落的井盐生产是没有好处的,但是,从实质来看,求雨仪式优化了井盐生产的村落内部与外部的社会关系,创造了井盐生产



和谐的大环境。也就是说,当盐业生产的需求与整个农业社会的需求相互冲突时,盐业村落能够与更强大的农业社会妥协、包容与调和,说明村落在尽最大努力与周围的农业村落协调一致,是把自己的盐业村落与大农业社会联系起来,而不是对立起来。因而,诺邓井盐生产民俗不是一个独立王国里封闭的、孤立的民俗事象,而是一个与大农业社会有联系的、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俗事象。通过对卤龙王权威下的求雨仪式的研究,可以进一步说明井盐生产民俗在诺邓盐业社会中的主导地位,也清楚地表明了诺邓的井盐生产民俗与农业民俗是相互链接,并达成了与周围广大区域的农业民俗的联系、通融与整合。

①(唐)樊绰:《云南志》,赵吕甫校释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年,第263页。“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、沙追井,西北有若耶井、诃溺井。剑川有细诺邓井。丽水城有罗苴井,长傍诸山皆有盐井,当土诸蛮自食,无榷税。蛮法煮盐,咸有法令。”

②明代中前期的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五记载:“五井盐课提举司,在浪穹县西北三百里,洪武十六年建置。内有吏目厅。所属盐课司五:诺邓井盐课司、大井盐课司、山井盐课司、师井盐课司、顺荡井盐课司。”

③被访谈人:黄金品。访谈地点:云南省云龙县诺邓村老人协会,南斗会上。访谈时间:2002年7月13日。访谈人:朱霞。

④⑤被访谈人:黄金鼎。访谈地点:云南省云龙县城黄金鼎老人家中。访谈时间:2003年3月6日。访谈人:朱霞。

⑥杨黄德说:“有一年,诺邓的老进士与杨大人,在大井的马翰林家做客。天池的湖里有一个龙王也去了,当时三个人不晓得他是龙王。四个人很谈得来,处成了朋友。晚饭后,就下了几点雨,大家都说,这个时候下雨不好。龙王说下雨好,是庆贺你们的意思。他还约他们去天池玩,说着雨又下了几点,他突然就不见了。大家才晓得他不是人,是龙王。”访谈地点:云南省云龙县牛舌坪村观音庙,观音会上。访谈时间:2003年3月11日。访谈人:朱霞。

⑦程云祥:《潮州求雨的风俗》,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《民俗》第13、14合刊,民国17年(1928年),第28—31页。

⑧⑨董晓萍、[法]蓝克利《不灌而治——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》,中华书局,2003年,第268页。

⑩《巴赫金全集》第6卷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8年,第8页。



⑪程正民:《巴赫金的文化诗学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147页。

⑫被访谈人:杨黄德。访谈地点:云南省云龙县牛舌坪村观音庙,观音会上。访谈时间:2003年3月11日。访谈人:朱霞。

(朱霞: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、博士)

